

# 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主编：王东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宾 张美芳 黄国文  
常晨光 曾 蕾 熊锡源  
戴 凡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王东风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306-02805-7

I. 功… II. 王… III. ①功能(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②翻译—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6499 号

---

责任编辑:习元

封面设计:楚天

责任校对:易正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辑部电话:(020)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电话:(020)84111998, 84111160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传真:(020)84036565

印刷者:

经销者: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规格:850mm×1168mm 1/32 13 印张 338 千字

版次印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印数 1-1500 册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序

王东风

翻译是一种古老的语言活动，古老得就和我们的语言一样，谁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有多老了。就笔者所知，最早的文字翻译的证据可能莫过于大英博物馆里从埃及“弄”来的那块镇馆之宝“罗塞塔碑”了。那半块黑不溜秋的石碑是1799年拿破仑的军队在埃及修建工事时发现的，上面用三种文字铭刻着一个文告，这三种文字分别是早已失传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民间埃及文和希腊文，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史料表明，早在周朝的朝廷上就已经有专门的翻译职位，名曰“象胥”，算起来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与翻译的实践活动相比，翻译的研究活动要晚一些。从文献上看，西方最早的翻译研究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即古罗马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始于公元前10年前后）；中国的翻译研究最早出现在公元3世纪的汉代，即佛经翻译时期。

人们常说，翻译家应该是杂家；当代西方后殖民翻译理论说，翻译是杂合。视角不同，却殊途同归。如果说翻译家是杂家的话，那么研究翻译的人就应该是杂学家了。有意思的是，最早的古罗马翻译研究文献和最早的中国佛经翻译研究文献都表明，中西最早的翻译研究也是殊途同归，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西方最早的跨学科视角是修辞学，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奠基人”的西塞罗（Cicero: 106~43 B.C.E.）在公元前60至前40年间就开始从修辞学的角度上探讨翻译过程中的风格转换问题（Cicero, 1997: 9）。中国最早的跨学科视角则是哲学的，被陈福康誉为中国“佛经译论开篇”（1992:

14)之作的汉代支谦(3世纪人)的“法句经序”记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译与意译的讨论,论辩之中,不仅有道家的理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也有儒家的理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支谦,1984:22)。

翻译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其道理并不难理解。既然翻译是杂合,这杂合之中就不仅仅只有语言杂合,那么探讨这种行为和存在的翻译研究也必定是一种杂合,一种必定会超越语言杂合的杂合。话又说回来,如今又有哪一门学科是纯种、纯天然的呢?当别的学科在讥讽翻译学找不到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的家园其实也是一种马赛克似的拼合,而且还忽略了自家的马赛克组合远远不如翻译研究的马赛克拼图那么色彩斑斓、那么神秘莫测、那么引人入胜。

回顾历史,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与翻译学密切相关的哲学、语言学和文论领域中,大凡一个大学问家,仿佛只有在他完成了对翻译的思考之后,才能实现其学问上的圆满,才能真正成为该领域的大家。西方是这样,中国也是如此。西方有马克思、恩格斯、尼采、叔本华、本雅明、施莱马赫、雅各布森、洪堡特、巴尔特、德里达、德莱顿、庞德、歌德、雨果、纳博科夫……。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最耀眼的思想家、文学家们,又有哪个没研究过翻译?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周作人、瞿秋白、郭沫若、林语堂、陈寅恪、茅盾、钱钟书……

在西方翻译学界,第一个轰轰烈烈地把跨学科的方法论系统地引入翻译研究的是曾经担任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奈达,他在尝到用语言学(主要是转换生成语法和语义学)的方法研究翻译的甜头后,又在翻译研究中引入了信息论、文体学、社会符号学理论等视角,提出了著名的功能等值论,这可以说是功能途径的翻译理论的最早形态,也是用跨学科的方式进行翻译研究最早成功的典范。

奈达引起的轰动使学术界开始关注跨学科的翻译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轮又一轮、一波又一波的跨学科翻译研究彼未伏

此已起。结构主义的有：语法学途径的，如卡特福德(Catford)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语义学途径的，如拉尔森(Larson)的《基于意义的翻译》；语用学途径的，如希基(Hickey)编的《翻译的语用学》；语篇语言学途径的，如纽波特和施赖夫(Neubert & Shreve)的《作为语篇的翻译》；符号学途径的，如高尔雷(Gorlée)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应用》、艾柯(Eco)的《翻译经验谈》；认知语言学途径的，如古特(Gutt)的《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等等。后结构主义的有：哲学途径的，如格雷厄姆(Graham)编的《翻译中的差异》；文化途径的，如列弗维尔(Lefevere)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后殖民主义的，如尼兰贾娜(Niranjana)的《翻译定位》；女性主义的，如福勒托(Flotow)的《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解构主义的，如戴维斯(Davis)的《解构与翻译》；等等，等等。从这个角度上看翻译学，这个学科正是一个五彩缤纷的马赛克组合。人文学科的各分支，甚至某些自然科学的分支，如模糊数学和人工智能，都可以是研究翻译的一个途径。

道理很简单，因为翻译是杂合。首先是语言的杂合。仅仅是关于语言的思考，就足以让哲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何况是杂合的语言？其次是文化的杂合，那杂合的语言之所以更加深不可测，正是因为那语言的杂合之中还有着异质的文化杂陈，其中还牵涉到话语权力和政治平等。再下来是文学，同质的文学尚有陌生化的挑战，更何况域外文学里那些匪夷所思的异质的陌生化。也正因为如此，关于翻译的思考就成了古今哲人智者展示其智慧的大舞台。

本书探讨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跨学科话题：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在思想界进入后结构主义的21世纪之初，这个话题是不是太结构主义？也就是说，是不是太过时？

诚然，在奈达率先在翻译学界推动语言学转向之后，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他所提倡的功能等值已成解构主义的笑柄。以奈达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译学理念是：原文的字词句一定会有一个恒定不变

的意义。这种超时空的静态语义“内核”正是等值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解构主义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哲学思辨,指出由于时间的延迟和空间的差异,人们要想在言语(尤其是书写的言语)之中获取那种超时空不变的解读,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在结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逻格斯中心的视野中,那恒定不变的意义是想当然的存在,是绝对的真理,而解构主义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指出了我们平常因为想当然而不再去想的真理本身存在着的结构上的漏洞和自相矛盾。解构主义者的一切行为似乎都与结构主义者南辕北辙。结构主义凡事追求方法论,凡事都一定要找到答案,一定要建立一个“模式”,而解构主义者似乎天生就是一个绝顶聪明的顽童,他们往往会在捣毁了一个金玉其外的殿堂之后,就拍拍手扬长而去,扔下目瞪口呆的结构主义建设者们,这其中就有我们翻译研究者。解构主义激进的思辨很像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名家。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苦心经营了许久的逻格斯中心在解构主义面前会“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冷静的学者面对这被颠覆的殿堂会思考那被解构的结构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漏洞;而好斗的经验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会守着已经是残垣断壁的遗迹,梦想着那大厦依旧辉煌,愤愤然欲以解构之道还治解构之身;更有急于求成者则用断章取义的、甚至误解的解构主义来为结构主义辩护。

我们大概不能低估德里达、巴尔特这样的哲学枭雄的智慧,不能把他们的智性的解构作人云亦云的简单化解读和批判。在他们的智慧面前,真正的结构主义大家正在反思。理论的发展本来就是要敢于否定,敢于面对新的挑战。结构主义译学理论的旗手奈达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功能等值论,晚年却发出“我的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Nida, 2001: 285)的感慨。这感慨是老人的郁闷,还是智者的反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道理谁都明白: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扬弃链。也许,由于年龄关系,奈达可能再也无力修正自己的理论或发动另一场革命。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一个伟人的老去而减

速。

那么，本书探讨的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的问题是否已经被历史遗弃？正如张美芳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此功能已非彼功能了。功能语言学是一个内涵十分广博的概念，语言一旦与功能相关联，就与语言的运用及其语境和目的相关联，因此，功能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既可以是细致入微、如化学实验的切片分析，也可以是与语篇产生与接受相关的社会、文化和认知研究。语篇是语言合目的、合语境的运用，翻译也同样如此，因此，任何翻译研究说到底都是与语言功能相关的研究，尽管有的研究未必要标上功能的标签。这部论文集里聚集着三种功能观，一种是奈达的功能观，一种是韩礼德的功能观，一种是德国功能主义的功能观。从比重上看，韩礼德的功能观占主导地位，德国功能主义功能观次之，奈达的功能仍余音缭绕。

韩礼德的功能观，就其博大的包容性而言，就像是一盅温水泡开的香茗，越品越香。早在20世纪60年代，卡特福德就用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理论对翻译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在国内也曾引起过一定的关注，尤其是他在该书中第一次对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所作的界定和讨论，着实让翻译界眼睛一亮。他对系统功能语法中“级转移”概念的应用和发展在西方翻译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随后而来的解构思潮的冲击，使国际翻译学术界开始把眼光投向了结构之外，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因此，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一研究路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重视。随着胡壮麟、朱永生、黄国文、张德禄等学者多年不懈的努力，如今中国学者已经对韩氏系统功能体系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在解构的躁动之后，翻译学者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解构之后的明天。

在奈达的功能等价值观渐渐远去之际，现在学术界关注的功能观除了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之外，还有德国功能主义的功能观。这两种功能观之所以能取代奈达的功能观，正是因为其中包含了综合的因素，都具有帮助结构主义突出重围的开放性机制。

这两种功能观虽然侧重点不同,却同样是殊途同归。韩礼德的功能观侧重语言或结构,德国功能观侧重语篇对目标文化的适应性。前者的功能视角与诗学理念接轨,可以派生出功能文体学和诗学理论,对文学语篇进行诗学分析,追求体现手段的一致性,其核心术语之一的“有标记性”与文学理论的“前景化”有相通之处,可为直译、翻译批评和翻译质量评估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后者追求不同语篇类型的目的性,瞄准的是语篇的接受效果,可为意译或改写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两种功能观的相同或相似点是它们在结构上的开放性和语篇分析模式的建立:前者关注语言的社会符号意义,后者关注文化,这都是语言以外的天地,沿此路可实现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分析,此其一;二者都强调语篇分析,把语法的概念由句法上升到了语篇,甚至超语篇的文化语境,强调普遍联系的原理,此其二。

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其出发点可以说是结构主义,但从本书中的论文来看,如今学者们的视野已不再像解构主义之前的经验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那样被不自觉地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之内了。在目睹了解构主义的摧枯拉朽之后,我们的记忆中已经留下了解构主义的印记,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传统翻译理论中所存在的漏洞,并开始探讨如何为这些漏洞制定补丁,这部论文集里就有翻译的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思考;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研究翻译的语言问题,这是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不可偏废。

解构主义常自嘲找不到家园,但翻译学者却并不认为自己没有家园,只不过这个家园刚刚才遭遇解构的龙卷风。解构主义呼啸而去之后,翻译学者还要思考被解构主义趁虚而入的那些结构上的漏洞将如何修补。也就是说,解构之后,我们到哪里去?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还要继续翻译。不能因为解构主义说,意义是不确定的,忠实不可能企及,我们就不翻译了。而一旦翻译,你的立场就暴露无遗,总有一个理念上的中心会从中显露出来。要么是异化中心取向,要么是归化中心取向。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说的“第三空间”或“第三条道路”

其实也同样是乌托邦,因为一旦我们把家园建立在第三空间了,一旦我们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就会同样建构一个中心,又同样会成为以解构中心为己任的解构主义的活靶。这就有点像韦努蒂,他用解构的利刃肢解了传统的归化翻译理论之后,显然又建构了一个异化中心论,尽管他一再声称,异化之中有归化,归化之中也有异化,但有意无意之间,他已经陷入了解构主义所批判的二元对立之中了。根茨勒毫不客气说,韦努蒂的那些“后结构主义的词汇是具有欺骗性的。韦努蒂的理论可能比后现代更现代派”(more modernist than postmodern)(Gentzler, 2003: 17)。“现代派”的思潮是在“后现代”之前,根茨勒在此是在挖苦韦努蒂的观念仍然局限在现代派的传统理念之中,虽然满口后现代即解构主义的词汇,其实骨子里还是现代派,即结构主义。

我们不能因为怕被解构就放弃翻译、放弃翻译的语言研究。解构的锋芒指向传统的翻译理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面对被揭示的理论漏洞视而不见。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思考解构主义批判之中的积极性因素,以及解构主义之后的翻译学走向。就翻译研究而言,解构主义迫使我们把专注的目光从文本之内转向了文本之外:从文本的静态分析,转向了文本生成与接受的动态成因;从文本的语言分析,转向了与文本传播有关的文化和批判。不难想象,当主流翻译研究走向文本之外的時候,它迟早还要回归,因为语言和文本毕竟是翻译的根本属性,但这种回归将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我们毕竟已经出去过,已经看到了文本之外的大千世界及其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

再看看我们现在讨论的功能,虽然仍然有纯结构的探讨,但从这个论文集中,我们会欣喜地发现,功能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已不再只是语法层面的静态比较了,而是有视野开阔的文化和符号学视角。开始有学者关注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意识及其中所必然蕴含的社会学和文化价值,把三元功能、语域与翻译的文化因素和意识形

态取向联系起来，这是多年来功能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的一个突破，而这一突破并没有背离功能语言学的那本应该是四通八达的轨迹。虽然这类文章所发出的声音现在还很微弱，但它似乎在昭示着一个后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时代的到来：一种跨学科的、发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研究，一种既关注语言又重视文化的研究，一种既有结构主义的严密又有解构主义的思辨的研究。解构主义的精神是消解一切中心，反对极端，关注边缘。结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的中心是结构，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抛弃了结构，走向了文化。再用解构的眼光来看现时的翻译研究的所处，如今的翻译研究就是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现实，其预设正是一个文化与语言的二元对立，而且是一个把语言边缘化的过程。这正是解构主义要解构的现象，而再用解构的锋芒来颠覆这个中心之后，我们又能走向哪里呢？大概只能走向语言与文化的结合，这与其说是一种回归，不如说是一种进步，一种扬弃。有道是，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解构主义时代的翻译研究呼唤的应该一种是既有结构分析又有解构思辨的的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深信，未来的翻译研究的走向必然是语言分析和文化/社会批判的结合，未来的翻译研究方法必定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未来的翻译实践也会因此而更加理性、更加精密、更加近真。

### 参考书目：

- Burnett, P. (ed.) *Translation, Transcreation*. London: Brunel University, 2003
- Catford, J.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Cicero, *The Best Kind of Orator*. Hubbell, H. M. (Tr.). Robinson, D. (e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 Davis, K.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lation*. Manchester & Northampton: St. Jerome, 2001

- Eco, U. *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 McEwen, A. (Tr.)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 Flotow, Luise von. *Translating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 Gentzler, E. "Translation,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the Americas". Burnett, P. (ed.) *Translation, Transcreation*. London: Brunel University, 2003
- Gorlé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Amsterdam – Atlanta: Rodopi, 1994
- Graham, J.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utt, E.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Hickey, L. (ed.)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Cleve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 Larson, M.L.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 Guide to Cross-Language Equivalenc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Nida, E.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Niranjana, T.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Robinson, D. (e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7
- 陈福康,《中国翻译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支谦,“法句经序”,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目 录

Global English, Covert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	Juliane House (1)
Lexical Cohesion and Conjunction: A Textual Study of the <i>Tao Te Ching</i> from the Hallidayan Perspective .....	Xiaohuan Zhao (46)
关于功能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	黄国文 (67)
翻译研究领域的“功能”概念 .....	张美芳 钱 宏 (77)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与文体 .....	戴 凡 (99)
从功能语言学的成篇功能论语篇翻译对等 .....	司显柱 (115)
语篇分析与译者的翻译策略 .....	熊锡源 (133)
影响译者中文选词之盖然性大小的诸因素分析 .....	邓志辉 (142)
从隐喻理论的发展看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	王岫庐 (154)
投射语言翻译中的主位视角 .....	曾 蕾 (161)
及物性对等与汉诗英译 .....	陈 刚 (177)
汉英篇章连接手段的辩证思考及翻译研究 .....	郭富强 (188)
论《尤利西斯》中语码转换的翻译及其功能的再现 ...	李红满 (201)
评价系统对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 .....	于建平 白塔娜 (216)
从批评话语分析看《红楼梦》英译中互文性的运用 ...	李妙晴 (226)
借功能翻译论浅析文学翻译的“化境论” .....	曹媛媛 (235)

- 功能语言学的语体观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 龙国富 (244)
- 英汉语法衔接对比与翻译 ..... 王东风 (254)
- 试从功能主义视角看汉唐佛经翻译
- 与明清科技翻译之意义比较 ..... 汤富华 (278)
- 意识形态与翻译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 谢应喜 (294)
- 论语篇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性思维特征 ..... 王秀萍 (303)
- 翻译技巧研究的功能视角 ..... 陈月红 张昆群 (315)
- “大爷”、“嫂子”及其人际距离 ..... 刘泽权 范哲巍 (326)
- 语言表达的准确度 ..... 蔡小红 (341)
- 建立定量的译文质量评价体系的新思路 ..... 张 政 (351)
- 文本类型学与功能语言学对翻译质量评估的
- 解释力 ..... 袁 洪 (360)
- 转化格律译法不可取吗? ..... 郭 晖 (371)
- 跨文化的中华典籍翻译探讨 ..... 金惠康 (381)
- 谈目的论中翻译策略的影响因素 ..... 喻锋平 (392)

# Global English, Covert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Juliane House  
(University of Hamburg, Germany)

In this paper I present a project currently carried out at Hamburg University's Research Centre "Multilingualism" funded by the German Science Foundation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This project investigates for the first time whether and how English as a global *lingua franca* influences texts in other languages. The paper is structured as follows: I first describe the project's background, detailing its research questions, its (working) hypotheses as well as its corpus. Secondly, I describe the analytical procedure used, and thirdly I present and interpret some of our results.

## 1 The Project "Covert Translation"

Globalised and internationalised communication in many areas of contemporary life has led to an increasing demand for texts that address members of many differen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mmunities. Such texts are either produced simultaneously in these different communities as what has been variously called "parallel texts" or "comparable texts", or they are translated "covertly" (House 1977; 1981; 1997) mostly from English, currently the dominant global *lingua franca*. In the project "Covert Translation" we<sup>①</sup> are trying to find out

---

<sup>①</sup>The project team currently consists of Nicole Baumgarten and Demet Özcedin as research associates and myself a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From 1999 until 2005 Claudia Böttger and Julia Probst also belonged to the project team as research associates.

whether and how English as *lingua franca* influences German and other European languages in multilingual parallel text production and covert translation. Parallel texts are texts on comparable topics which, despite being produced in differing environments, belong to the same genre and fulfil the same function. Covert translations are translations in which the function the original text has in its discourse world is maintained through the use of a “cultural filter” with which culture-specific source language norms are adapted to the norms holding in the “receiving” language community. In view of the impact “Global English” has been having on other languages in many influential domains of contemporary life, this process of adaptation or cultural filtering may now be in a process of change. We therefore ask in this project whether maintenance of target culture norms in multilingual text production and covert translation is currently no longer operative such that source and target norms are in a process of convergence.

The general hypothesis underlying this project is therefore that German (French, Spanish, later also Persian, Chinese) textual norms are adapted to Anglophone ones. More concretely, and initially for German only, we assume that these adaptations can be located along a limited set of dimensions of culturally determined and empirically established communicative preferences such as preferred foci on the interpersonal or the ideational function, and on informational vagueness or specificity. These (and other) dimensions have emerged from a series of German-English contrastive pragmatic discourse analyses conducted by the present author (cf. for recent summaries see House 2003; 2006), and from analyses of translation texts in different genres (House 1977; 1997). But changes along these dimensions may also entail lexicogrammatical “Anglicisation” in terms of, for instance, information structure,

perspective, and word order.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contrastive work (cf. e.g. Clyne 1987; Fabricius-Hansen 1996; Doherty 1999; House 1996; 2003) I set up the following initial hypotheses for the project:

1. A shift from a conventionally strong emphasis in German discourse on the ide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to an Anglophone interpersonal orientation focussing on addressee involvement.

2. A shift from a conventionally strong emphasis on informational explicitness in German texts to Anglophone inference-inducing implicitness and propositional opaque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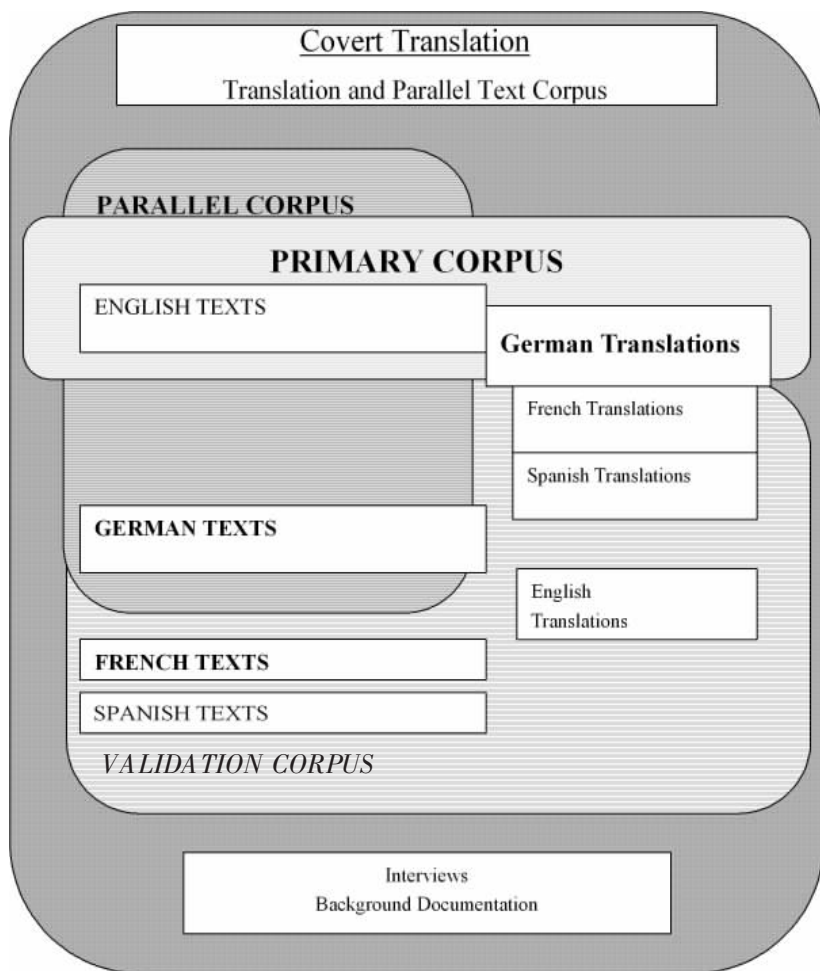
3. A shift in information structure from packing lexical information densely and integratively in German texts to presenting information in a more loosely linearised, “sentential” way.

4. A shift in word order such that the German “Satzklammer” with its two discontinuous left and right parts gives way to more continuous, juxtaposed positions of the two parts.

To test these hypotheses we put together a corpus holding at present some 550 texts (800 000 words) that reflect a sphere of text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which is of pervasive, global socio-cultural influence. <sup>②</sup> The structure of the corpus can be displayed as in figure 1 below:

---

<sup>②</sup> For other and somewha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rpus use see e.g. Baker 1999; Doherty 1996; Fabricius-Hansen 1998; Schmieid and Schäffler 1996; Steiner and Yallop (eds.) 2001.



**Figure 1**

To get an overview of textual norms and language conventions operative in genres especially influenced by global English, we investigated internationally operating business companies and supra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troduced our design and asked for texts